

The background of the cover is a traditional Chinese ink and wash illustration. It depicts a woman's face in profile, looking down with a gentle expression. Her hair is styled in an elaborate, high bun with intricate braids and is adorned with a decorative headpiece featuring swirling, cloud-like motifs. A branch of a peach blossom tree, with several pink flowers in various stages of bloom and green leaves, extends from the bottom left towards the center of the woman's face. The overall style is elegant and artistic, typical of classical Chinese painting.

蒋星煜 著

桃花扇

研究與欣賞

蒋星煜 著

桃花扇研究欣赏

潘允基题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桃花扇》研究与欣赏/蒋星煜著.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ISBN 978 - 7 - 208 - 07518 - 4

I. 桃... II. 蒋... III. ①桃花扇—文学研究②桃花扇—文学欣赏 IV. I207.3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68141 号

封面绘图、题签 汤兆基
责任编辑 杨柏伟
封面设计 杨钟玮
美术编辑 杨德鸿

《桃花扇》研究与欣赏

蒋星煜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世纪出版集团发行中心发行

常熟市新骅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90 × 1240 1/32 印张 10.25 插页 3 字数 228,000

2008 年 1 月第 1 版 200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250

ISBN 978 - 7 - 208 - 07518 - 4/I · 478

定价 20.00 元

序

一

一部作品能否流传？能否产生深远的影响？首先是由作品的题材选取、思想内涵、文学造诣决定的。其次，作者的家世源流、社会地位、政治动向也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显然，两者有主次之分。但在特定情况之下，有时主次之分相当难断，都各有其无可讳言的，或依稀可辨的种种因素存在，要进行梳理，那是颇为艰苦的工作。清代孔尚任的《桃花扇》属于这一种情况。孔尚任的《桃花扇》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写作、完成的？是首先要弄清楚的问题。

二

孔尚任和任何元杂剧、明清传奇作者的家世源流截然不同，因为他是被封建社会尊奉为“万世师表”的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

“万世师表”决不是一个抽象的形容词，在中国长达二千年的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孔子的学说被平民百姓尊奉为修身、齐家的基本原则，被历代历朝的帝王尊奉为治国、平天下的主要依据。也就是说，孔子的学说经过多年来的继承和发展，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化最主要的组成部分，其影响无所不在，政治、经济、社会等等各个方面无不以孔子的学说为核心。这是客观的存在，无可争辩。

话说回来,孔子的学说内容非常丰富,涉及的面相当广阔,单就政治思想领域而言,则是夷夏之大防与君臣之大义。孔子明白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无君。”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如果认为孔子是狭隘民族主义者,那就是犯了反历史主义的错误。到了辛亥革命时期,才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提法。建国以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具体的情况相结合,我国才开始营造与各兄弟民族共同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国家。在二千年之前,情况完全不同,主张夷夏之大防有其必然和积极作用。在孔子心目中,制礼作乐,促进全社会文明是头等大事,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则是前提,否则一切努力都是白费的。



山东曲阜孔林内孔尚任墓

管仲相齐桓公成就霸业，实施了许多富国强民的政策，但孔子却特别强调了“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认为管仲为捍卫华夏文明立下了不朽功勋。

承平时代，夷夏之大防，只是一个理论问题。但在宋亡元兴、明亡清兴这两次改朝换代之际，则成了一个十分具体的不得不面对的实际问题。坚持抵抗，恪守了夷夏之大防，大节昭然。不得已而求其次，隐遁山林，足迹不入城市，采取不合作对策，也能得到理解、谅解。至于张弘范之降元、洪承畴之降清，当然和夷夏之大防这一原则是背道而驰的。

明末清初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一批知名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抗清的武装斗争，他们的学术论著也都带有相当鲜明的民族意识，对当时的文人影响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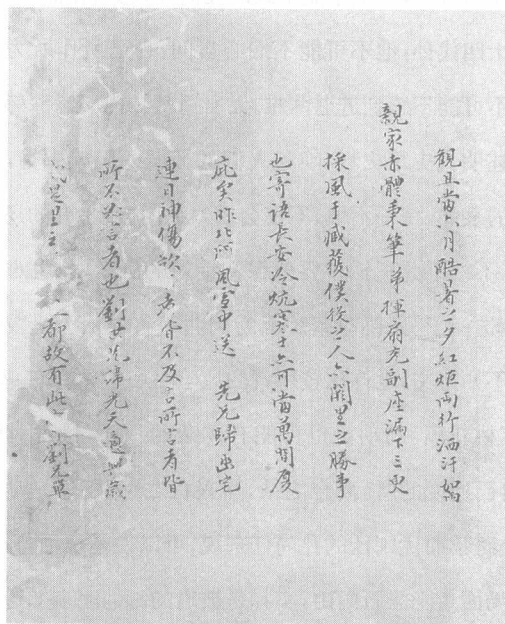
康熙十七年(1678)，乡试未能中式的孔尚任，隐居在曲阜的石门山中，作为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他不可能不扪心自问：自己所作所为是否恪守了夷夏之大防。他不可能不感到进退两难，无所适从。内心深深感到痛苦。

修订或撰述明代史籍史料，唤起人们的怀旧的民族感情，或者用诗歌抒发对明代灭亡的哀痛，稍一不慎，不仅会招致灭门之祸，有的还株连九族。孔尚任都看到了，不敢蹈此覆辙。要他保持绝对的沉默，他也难以做到。在极度矛盾之中，他选择了写《桃花扇》，因为词曲一直被认为是“小道”，被重视、注意的程度远不如诗文，也许比较所冒的风险小一些，安全一些。

孔尚任写《桃花扇》的动机也可能有复杂的一面，抒写对明朝灭亡的哀痛，或者如他自己所说的“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仅仅是动机之一。乡试未能中式，对企盼学而优则仕的孔尚任来说，可以说是一种打击。今后咋办？他面临严峻的局面。隐居石门山，实际是被迫的。他完全知道古代文人走终南捷径的不少，以退为进，用隐居博取名声，也可能得到更顺利的进入官场的

通道。写《桃花扇》同时可炫耀一番才华与文采，那又是一举两得了。他的《告山灵文》结束时说：“俾居者安善其体，明哲其心，既不貽讥北山，又不……”那是因为孔稚珪的《北山移文》讥笑周顒隐居不久，就出山为官了。孔尚任声明他绝不会学周顒的样。这句话颇有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

而所谓“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也经不起检验。所谓“兴亡”，当然是清兴明亡。《桃花扇》写了众望所归的史可法无力制止马士英、阮大铖倒行逆施，贪鄙享乐，江北四镇的相互火并，南都有正义感的文人都受到残酷迫害，这种种都是“亡”的一方面的景象。清军杀进扬州、攻占南都等等场面当然不能写，实在万不得已要出现“清兵”字样时，也改用了“北兵”的称谓。可见他的写《桃花扇》颇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



孔尚任墨迹

孔尚任隐居的时间很短促，不到两年，便出山了。

中国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更替都是以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结束。群雄纷争时，失败者大多兵败身亡。朝代更替时，亡国之君沦为阶下囚，命运亦惨。但是，曲阜的孔府、孔庙、孔林却是十分特殊的国中之国。孔子嫡传的子孙中每一代都有一位衍圣公。也就是说，孔子是圣人，每一代也都有一位世袭的圣人，在政治上享有种种特权。

当时的衍圣公孔毓圻曾请孔尚任出山为其夫人治丧，并修《孔子家世谱》、《阙里志》。康熙二十三年，皇帝来曲阜祭孔，孔尚任为之讲经导游，很受赏识。孔尚任本人将经过情况写成《出山异数记》。他讲了《大学》的第一节和《易经》的第一节。其内容确实与“夷夏之大防”无直接联系，孔尚任讲的时候也尽量迎合康熙皇帝的心意，所以被破格任命为国子监博士。

尽管《出山异数记》孔尚任对康熙的歌功颂德可以理解，但是毕竟做得过分了。尽管讲《大学》、《易经》也只能迎合康熙的立场、观点，但是他也做得过分了。可以说把孔子学说中的略有民主思想、民族思想的内容全都删除了、篡改了。并且显得卑躬屈膝，多少有点失去文人的尊严。更何况孔尚任不是一般的文人，而是孔子的第六十四代孙呢？所以有的人就为之困惑不解，《出山异数记》和《桃花扇》好像很难设想是同出于一人之手。

我们应该知道，孔尚任是乡举落第才归隐石门的。由于孔子的“夷夏之大防”观念的深入人心已久，作为孔子的六十四代孙更不可能例外，要忘记也忘记不掉，故写《桃花扇》。但他的“学而优则仕”的想法并未因改朝换

代而改变，所以用世之心仍然强烈。他无时无刻不在等待用世的机会。

乡试中式，一举成名天下知，自然是进入官场的康庄大道。可是，天下的举人有的是，有的县份，同科的举人多达四五人，并不罕见。而御前讲经，确是千载难逢的良机，而且仅选了他孔尚任这一人。他当然要尽最大可能取得康熙的好感，绝对不能错过。所以他的讲经，根本不是什么学术活动，无异一次单独一个人参加的殿试。与殿试不同的，是他和康熙有更多的对话、交流的机会。孔尚任没有错过这个机会，他成功了。国子监博士，品级不十分高，却是全国拔尖的知识分子的导师也。

那末，他又为什么要写《出山异数记》呢？主要的目的应该是让康熙皇帝知道他孔尚任如何感恩戴德，对他来说，自然有利于将来的升迁高官。是否有向朝野文人中夸耀自己的受到康熙的赏识呢？似乎也不能排除。

进京就任国子监博士，是一桩大喜事。此时此刻，孔尚任走到了十字路口，面临严峻的选择。决定从此一心一意步步攀升的话，继续设法再谋取康熙的好感，也不失为识时务的俊杰。有了御前讲经的资本，有了国子监博士这块踏脚板，似乎到六部衙门弄个郎中以上的官职并不难。石门山中写成初稿的《桃花扇》就不必再去加工了。把稿子焚毁，不留下痕迹，则更保险。另一条路则反是，如果严格遵守“夷夏之大防”而进行反思，他会觉得御前讲经并不是什么光荣，作为孔子第六十四代孙，他的应举、讲经，都心中感到惭愧，在孔子牌位前抬不起头来。找一个借口，称病辞掉国子监博士，再进石门山，继续写“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桃花扇》。

孔尚任没有看懂孟子说的鱼与熊掌两者不得兼的道理，他两者都要。国子监博士，很清高的职位，他决不放弃，进京上任。《桃花扇》呢？他已倾注了明亡之痛的浓烈感情，而且在艺术上也作许多努力，尤其语言文字，更

展示了才气和才华,也不能放弃,要继续加工。于是携稿进京。对孔尚任来说,无异戴着镣铐跳舞,显然甚为艰苦。

根据三纲五常,君臣之大义,孔尚任御前讲经,受到殊荣,他在《出山异数记》中,对康熙皇帝感恩图报之心几乎到了肝脑涂地在所不惜的地步,当然这一位国子监博士是忠到极点的忠臣。问题并不如此简单,一般满族、蒙族的臣僚,对康熙皇帝的效忠比较单纯,其情况大致相当于汉族臣僚对待汉族皇帝,这中间少了一层隔阂。当时效忠于康熙皇帝的汉族臣僚有一大批,但他们不是孔子的嫡传后裔,更没有在曲阜御前讲经的经历。他们固然脑海深处也有“夷夏之大防”的烙印,但比较浅比较淡,而孔尚任则不同,这个“夷夏之大防”的烙印由于万世师表孔子是他的直系亲族而显得特别深刻,此时的效忠康熙又显然很难说成是和“夷夏之大防”的道理相吻合的。孔尚任陷入了思想上的尖锐矛盾而无法自拔,他之所以“戴着镣铐跳舞”,自有其必然性。

孔尚任把《桃花扇》初稿带到北京之后,一开始并未引起广泛的关注,如他的《桃花扇·小引》所说:“今携游长安,借读者虽多,竟无一句一字着眼看毕之人,每抚胸浩叹,几欲付之一火。”孔尚任要浩叹的原因何在呢?因为如人们不仔细阅读《桃花扇》,则难免对他产生误解。炫耀才华,仍是次要的问题。他很希望北京的士大夫们都知道新来的国子监博士有着强烈的兴亡之感,对已成为历史陈迹的朱明王朝仍旧是深深怀念着的,他渴望这种理解或谅解,以求得内心的暂时的平衡。但是,他失望了。

事情总是错综复杂的,《桃花扇》此时没有引起广泛的关注,他虽失望,而“夷夏之大防”和“君臣之大义”的矛盾也因此暂时冻结而没有进一步激化。

四

康熙二十五年，南巡之际，发现不仅黄河、淮河水患仍旧严重，高邮一带也洪水泛滥，于是派工部侍郎孙在丰负责疏浚河道，以利出海。不知康熙皇帝如何考虑的，孔尚任也被安排在孙在丰手下，协助其工作。

事情就是这样巧，这样的安排对孔尚任来说，为他加工修改、充实《桃花扇》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当年写作初稿时，他主要是参考了《樵史》、《绥寇纪略》等史籍以及侯方域、钱谦益、杨龙友、吴伟业等人的诗文集，此外，“族兄方训公”、“舅翁秦光仪先生”也口述了些许明代崇祯末年的情况，虽然材料不少，孔尚任仍旧缺乏切身的感受，所以觉得比较单薄。如今南下治河，他决定工作之余尽可能实地考察一下扬州、南京一带的当年战争遗迹，并访问仍健在的遗老隐逸，使《桃花扇》所写史实得到进一步的核对，如有真切动人的细节，亦考虑有选择地写进作品。所以，他随孙在丰出发时，当然也把《桃花扇》的初稿带在身边了。这一切，康熙皇帝自然不可能知道，孙在丰和其他官员也无从知悉，只有他自己心里明白。

治河的工程线拉得非常长，所以住宿在何地也不是很固定，好在基本上是在扬州昭阳（兴化）周围。孔尚任的设想一开始便遇到了困难。残垒、空壕、荒村等等，完全可以去凭吊，但遗老隐逸，一听说这位治河官员原来就是写过《出山异数记》的孔子六十四代孙，便有些鄙视和厌烦，不愿接待。也许正是《桃花扇》初稿逐步扭转了局面。黄云（黄仙裳）是第一位接待孔尚任的隐士，通过黄云的介绍，他以后又结识了许承钦（许漱雪）、李清（李映碧）等人，而且彼此之间都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孔尚任和遗老隐逸谈话的主要内容不是治河，不是一般的朝政或闾里琐事。康熙二十八年，孔尚任随同蔡铉升等多人在南京冶城道院集会赋诗，基本上以隐逸为主。孔尚任的诗有这样四句：“正好吟诗传茗椀，无端吊古拂苔砖。道人丹药寻常事，只有兴亡触后贤。”他们所谈的主要是“兴亡”，而孔尚任的《桃花扇》则是“借儿女之情，写兴亡之感”的，正好对得上口。也就是说，他们每一次集会，无异为孔尚任办了一次《桃花扇》的历史题材研讨会。

康熙二十七年，许承钦、黄云、邓汉仪、孔尚任诸人集会，所谈的“兴亡”十分明确就是清兴明亡的内容：

开瓮墙头约，天涯似耦耕。
柴桑闲友伴，花草老心情。
所话朝皆换，其时我未生。

追陪炎暑夜，一半冷浮名。

此诗被孔尚任编入《湖海集》，诗后复有邓汉仪注：“漱翁以八十四老人，诗酒之兴不减。一夕快谈，差销旅寂，然不堪为门外人道。”看来这次聚会，人不是很多，所以谈了一些冒犯朝廷忌讳的事情，不能外传。具体的究竟是哪些事情，无从得知。清兵攻破扬州之后的连续十天的大屠杀等等也很可能，史可法严拒多尔衮的诱降等等也有可能。如果传扬出去，肯定要引起灾难。孔尚任听了，材料是否能用，则不一定。但是，对于“兴亡之感”能起强化作用、膨化作用是没有疑问的。

孔尚任在扬州，不止一次到了梅花岭，展拜史可法的衣冠冢。也都留下了诗篇。第一首是《九日同人邀梅花岭登高分韵》：

携手荒台日未低，四周烟树意凄迷。

不知何代行宫路，只见今秋种菊畦。

脱帽频搔衰鬓笑，看山忽为古人啼。

登高宴上同吟者，一首新诗醉似泥。

他们都为壮烈殉国的史可法痛哭了，当然也是为明代的灭亡而痛哭了。孔尚任的感受也就可想而知了。另一首题为《梅花岭》：

梅枯岭亦倾，人来立脚叹。

岭下水滔滔，将军衣冠烂。

清廷为了缓和民族矛盾，旌表了一批为明尽忠报国的将士，史可法也在其内，鉴于史可法遗骸已无法可查找，士民为其在梅花岭立了衣冠冢，朝廷也未干涉，但也未妥为保护，所以没有多久，就倾废了，再没有人来修缮。孔尚任不禁为之长叹息。《桃花扇》中《沉江》一出写史可法之死感人至深，决不是偶然的。孔尚任笔下，史可法是全剧中最忠义、最正直的英雄人物。他在史可法身上倾注了无限深情，这种深情是长时期积累的。

在南京，他去拜访了足迹不履市街的龚贤（龚半千）。他是著名的画家，也是诗人。明亡以后，他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有《与费密游》诗三首，第二首为：

登临伤心处，台城与石城。

雄关迷虎踞，破寺入鸡鸣。

一夕金笳引，无边秋草生。

橐驼尔何物，驱入汉家营。

对满族的人主中原，表示了强烈的愤慨。孔尚任的来访，他接待了。孔尚任有《虎踞关访龚野遗草堂》：

.....

我来访衡门，其年已老寿。

坐我古树阴，饱我羹一豆。

娓娓闻前言，所嗟生最后。

.....

所谓“前言”，就是谈从前的事情，也就是关于兴亡的事情。这正是孔尚任迫切希望得到的材料。他所访问的另一位遗老是张薇，《白云庵访张瑶星道士》一诗，最后几句是：

.....

埋名深山巅，穷饿极淹蹇。

每夜哭风雷，鬼出神为显。

说向有心人，涕泪胡能免。

张薇本为明代锦衣，明亡入山，大有不食周粟的气节。他每夜痛哭，亡明的列祖列宗、史可法等壮烈殉国的英灵，又在他脑中、眼前一一出现。谈到这些，他们两个人不免痛哭流涕。又说：“数语发精微，所得已不浅。”看来孔尚任确实从中有了感悟，于是把他写进了《桃花扇》。用他出场，向割不断花月情根的侯方域、李香君指点迷津，结束这一悲剧。

也许是孔尚任为《桃花扇》的加工修改所进行的采访工作，范围相当大，在文人之间成了话题，所以传播了开来，所以此时隐居在故乡如皋的耆老冒辟疆，居然主动来找晚辈的孔尚任，向他介绍当年的南京的种种情况。应该说，这次冒辟疆的来访，而且在一起长谈多日，所起的作用极大，因为此人在甲申、乙酉之际，是南京著名的风流才子，和侯方域、李香君、杨龙友，乃至柳敬亭等都熟悉之至，他所说的当然是亲身经历的第一手材料。从后来孔尚任写给冒辟疆的书信中，可以证明孔尚任对他的万分感激之情。

对于历史遗迹,他在南京去展拜过明孝陵、明故宫,也去过栖霞山、秦淮河,寻找过当年秦楼楚馆所在地的板桥。这一切,不仅进一步引发了兴亡之感,使得他在抒发兴亡之感时能够非常形象化而引起人们的共鸣。

孔尚任既然是带着《桃花扇》南下的,我们不能排除他随时作些增删、修改的可能,但集中的修改是在康熙二十六年八月进行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康熙二十九年孔尚任返京,继续担任国子监博士时,《桃花扇》的所谓二稿已经十分接近现在传世的三稿。因为《桃花扇》许多唱词和孔尚任在扬州、兴化、南京时所写诗词在内容上、思想感情上,甚至在用词造句上相似、相同之处很多。兴亡之感的抒发恐怕也已达某种极限,再不稍事收敛,难免文字狱的灾难了。

五

孔尚任从南方带回北京的《桃花扇》二稿兴亡之感更强烈了,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为舞台实践铺平了道路。因为孔尚任是在遗老李沂的关注之下进行修改的,李沂把先人留下的枣园给孔尚任住了下来,让他安心工作。李沂的族兄李映碧显然也到过枣园,有所介入。十分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并不仅仅在文字上、回目上的推敲与增删,还曾有伶人参加了排练,用以检验舞台实践的效果。因此,《桃花扇》初稿是案头之曲,二稿则是场上之曲了。

再说孔尚任的诗文日益得到好评,他在治河期间,康熙南巡到了治河工地,还特地召见,慰勉有加,更提高了孔尚任的身价。于是,四年前颇受冷遇的《桃花扇》的命运立刻随之发生明显的变化。《桃花扇·本末》说:

“王公荐绅，莫不借钞，时有纸贵之誉。”更主要的是朱门豪宅都竞演此剧，达到了“岁无虚夕”的程度。

但是，朱门豪宅的主人，孔尚任所交往的中高级官员他们的思想感情和黄云、邓汉仪、冒辟疆、龚贤等不可能是一样的。身居高位者，唯恐失去既得利益。那些非常尖锐的语言、生动的情节诚然能使“故臣遗老”怆然伤怀，也可能酿成重大的灾难。因此，“兴亡之感”也只能略为淡化，否则，就不必在“己卯之六月”再写三稿了。关于这一点，我现在还无确证，只是一种推测。

《桃花扇》在传抄，在上演，孔尚任没有料到的是康熙亲自过问此事了。如《桃花扇·本末》所说：“己卯秋夕，内侍索《桃花扇》本甚急，予之缮本莫知流传何所，乃于张平州中丞家觅得一本，午夜进之直邸，遂入内府。”此一情节，实际有破绽。《桃花扇》之传抄者愈众，原作者孔尚任更不可能自己手边反而一本也没有，因为传抄并不是征集文物，完全可以从他人抄本转抄，孔尚任时时在关注自己的剧作，更绝不可能自己手边一本也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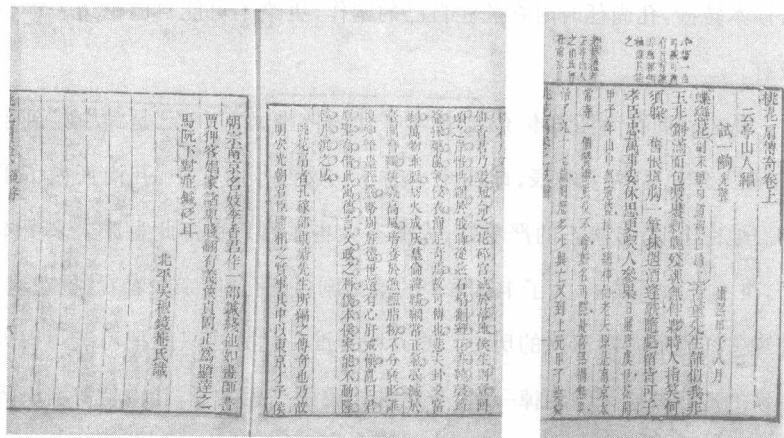
从内侍向孔尚任索本子，到把本子让内侍带回宫中，已是“秋夕”到了“午夜”，经过了两个时辰、即四个小时了。这四小时之中，孔尚任做了手脚。他完全明白，事态的严重性，大概有人告了密。皇帝此番派人来要本子，决不是为了娱乐，为了丰富宫中的演出剧目，而是要亲眼看看《桃花扇》究竟怎样处理明亡清兴的历史。咋办呢？惟一的办法只能把可能写得太尖锐的地方改掉一些删掉一些，于是推托家中已无本子，让内侍等着。等到删改告一段落，再凑成一个本子，由内侍带回去。

写明亡清兴的历史，题材本身就决定了绝对不讨好。站在康熙皇帝的

立场,顶好不提、少提清军入关到基本上消灭各地反抗清代统治的武装,统一全国的任何事件。即使完全站在清朝廷的立场,也写不好,否则的话,他早就派人写这一种题材的传奇剧本了。

而《桃花扇》是孔尚任最初根据曾在明崇祯朝为官的亲属口述的回忆写出的初稿,孔尚任在南下治河期间又走访了一大批遗老、隐逸,凭吊了一批见证兴亡的历史陈迹,引起了许多感慨,流了许多伤心泪,然后写出来的二稿,即使经过细心的删改,康熙看了仍旧极不满意是必然的。

不处分孔尚任的话,也不好,《桃花扇》显然在激发人们的反朝廷的感情。将孔尚任置之于文字狱,原只要吩咐一下,大狱立刻就构成了。但也难处,孔尚任不是一般的文人,他是孔子的六十四代孙,这样做真比投鼠忌器还麻烦,影响很不好。如果像别的文字狱那样株连家族呢?麻烦更大,那岂不要把衍圣公也处死吗?那真牵动大局了。所以暂时没有处置。隔了一定的时间,等孔尚任就任户部广东清吏司员外郎之后,才罢他的官。



康熙刻本《桃花扇》(上海图书馆藏)